

OXFORD

羅永生

B M 0 1 3 7 / G 0 0 1 8 4 1 0 0 1 9 9 7 0 0 0 0 2 0 4 6 0 0 2

殖民無間道

Re-theorizing Colonial Power

殖民無間道

羅永生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First published 200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殖民無間道

羅永生

ISBN 978-0-19-549657-4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序 言

序 言

收在這本集子裏的文章，有舊作，有新寫的。最早的一篇寫於九十年代中，也是我對文化研究開始發生興趣的時候。後殖民評論是文化研究其中一門顯學，不過，最能令我產生動力去書寫殖民主義問題的，還是成長在一個殖民社會的親身經歷，以及八十年代以來，目睹殖民主義怎樣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走過。

六七暴動的時候，雖然仍不大懂事，但我還是會朝人家指着發現「土製菠蘿」的地方興奮地跑去，湊看熱鬧。不知就裏地，回家卻見父母，慌張地把一些原來成了「煽動刊物」的報章扔掉。大學的時候，課堂上聽教授解釋甚麼是去穩定一個殖民地的秘密，下課後卻跑到機場抗議英國首相說要續管香港，搞刊物，辦活動，為的是與當時的「維持現狀」派辯論。畢業後，曾經一度高興自己能趕上那一班，由我們那一代開行的「民主回歸」列車。

可是，這列快車很快就遇上一個大時代，在這個大時代面前，這列快車煞停了。煞停的原因是，我們再搞不清楚，那是一班與香港的殖民過去分手道別的「回歸」專列，還是一班由殖民地出發，卻保持（殖民）現狀運行五十年不變的「直通車」。

早前在辯論中倒下去的「維持現狀」派，在現實中慢慢借屍還魂。是狡猾歷史的報復。我開始明白，

沉澱久積的歷史印痕，並不單是揮舞寫上口號的旗幟可以輕易抹去洗掉。相反，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性格，早已深入香港社會骨髓。

九十年代中，我寫成自己第一篇關於香港殖民處境的分析，與其是因為想向當時的讀者，介紹文化研究、後殖民主義理論在思辯上的精彩風格，倒不如說是受「殖民/反殖」的影子縈繞的自我，一種文字的療救：解構去蔽、重組案情，讓我回望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我們，讓我們重新出發。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曾經是香港殖民地性質的標號，當年英人續租不遂之後換來的，卻是一句「五十年不夠，一百年也可以」。我們身處的，也許就是這種（後）殖民的詭譎時空：還未曾開始，就已經結束；宣告了結束的，其實還未真正開始……時間上的永遠負債。

維持現狀既是這瞬息萬變的殖民城市背後的秘密，我們這一代出走殖民地的欲望，也許就在起步一刻，已註定要不斷回望。然而，沒有記憶，就沒有主體的我。殖民文化的深刻效應，亦正在記憶與遺忘的複雜操作中，改寫主體的我。這本小書裏頭，記錄了我十多年來對香港殖民歷史處境的反思，它們啟發了我對其他相關研究課題和領域的興趣。不過更貼切的說，裏面其實是一些拒絕遺忘的個人見證。

我這一輩香港人都曾在一段叫「過渡期」的漫長時間活過，在這「過渡期」終結了十年的日子，高興這本書能夠及時面世。畢竟，這還是一個大時代。

目 錄

vii	序 言
1	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
45	[晚] 殖民城市政治想像
69	香港的殖民主義 [去] 政治與文化冷戰
93	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
115	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 [後] 殖民解讀
125	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
139	解殖與民族主義
151	“我們的邏各斯？” 解讀莊子、德里達和列維納斯之間不可言說的倫理學

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¹

自一八四二年開始，香港的不同組成部份（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由滿清政府相繼割讓或租借予英國，合成一個條約商港（treaty-port）。雖然今日中國政府一直維持着一種官方立場，否認香港為一個殖民地，堅持一九九七年關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其實只是“恢復行使主權”，然而，將香港視為一殖民地的想法，仍然是一種流行共識。雖然中國政府對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興趣，遠大於在香港提出“反殖民主義”或“非殖民地化”的計劃，但在一切非官式場合，以殖民主義來形容香港過去的歷史，一直沒有遭到中國的質疑。可是，無論華洋學者，對於香港殖民主義的性質，卻一直少有深入研究，更難以談得上對香港的殖民歷史經驗，建立起系統的理論認識。²在一段長時間，香港的研究者，往往滿足於將香港視為殖民統治歷史中，一個難以歸類的特例。

為探討這種普通觀感和理論分析之間的落差，我們不得不回顧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那段歷史會告訴我們，雖然攫取香港的大歷史背景是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但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在奪取香港之初，並沒

1 本文原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六十期（2005），頁145-177。

2 比較明顯的例外是Tak-Wing Ngo (1999)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有即時為香港帶來一套完整的開展殖民統治的理念和策略。相反地，根據不少近代東南亞商業和鴉片貿易研究者的研究所指，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在東南亞和中國南海一帶，早有不少華人與歐洲商人進行廣泛的商貿交往和接觸，其中不少人更參與了英人帶動的鴉片貿易活動。甚至當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貿易之後，有部份華人照樣與英人合作。他們在鴉片戰爭進行期間，甚至為英國海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情報。英國商務監督義律 (Elliot) 大臣在鴉片戰爭勝利後，游說英皇向清政府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作為其中一項戰利品。他所持的一個藉口，就是要以香港一島，“給那些我們 [英人] 長期以來賴以獲取幫助和補給的本地民眾提供保護”，並視之為一“公義之舉”。³

勾結者・華人自治・秘密會社

事實上，據這些研究所指，居住中國東南沿岸的華人，積極為英人在東南亞佔領的各個殖民地提供多種服務，他們隨英人勢力所及，四處承接各項建造工程。而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自廣東地區和東南亞來到香港開展建設工程而致富的華人不計其數。當中最活躍的，亦包括那些被清政府視為海盜，長期居於水上的“蛋家”族群。他們長期被陸上居民排斥，禁止

3 見 Carroll, J. M. (1999) "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g of British Hong Kong" in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pp.13-29.

在陸上置業、婚嫁和考科舉。但在英人治下的香港，他們卻逆轉了自身的命運。就這樣，早期的香港充斥着這一群群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他們才是英人在香港殖民建設的中堅，以致有論者稱，香港其實是被這些移居進來的華人所壑殖 (colonized)。為報答他們的幫助，英人更向這些“勾結者” (collaborators) 賜地，使他們隨後能夠投身土地炒賣而致富，成為香港本地首次出現的顯赫家族。

往後，香港在鴉片貿易和大規模的苦力 (coolie) 貿易中迅速發展，漸次成為東亞鴉片和苦力買賣的最大中轉站，這情況一直維持至二十世紀初。市內煙館、賭館、娼館林立，罪惡橫行。英人既不願意，亦無力直接管治華人，甚至早年曾試圖正式確立華洋隔離分治的法律制度，亦未能成功。原因在於，香港與其他東南亞英屬殖民地不同的是，英國人甚至找不到這裏的地方長老，行使另一套適用於華人的法律，以便建立一種持久的“間接管治”。再者，從這些以各種犯罪、冒險活動而致富的華人群體中，英人根本找不到他們能信靠，和真正會執行法律的清廉華人警治隊伍。⁴

所以，早期香港的一段長時間內，華人新富與英人一直保持一種互不干涉的政治關係。一方面，港英殖民當局擁有非常集中的專制權力，但另一方

4 見 Munn, C. (2000) "The Hong Kong Opium Revenue, 1845-1885" in Brook, T. & Wakabayashi, T.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面，這些權力卻甚少被運用於華人事務的管理。而華人社群則由一種缺乏正式確認地位的習俗所管治。華人新富積極地扮演他們以前曾被禁止擔任的中國傳統士紳 (gentry) 角色，形成一個實質上而非法律上的自治社群。他們集居在太平山，建立起“文武廟” (Man Mo Temple)，司管祭祀和非正式地處理各種華人之間的事務糾紛。

雖然，這群人的政治地位，從沒有被英國人正式確認，而當中不少人，亦長期被清政府視為賣國叛徒，不過，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卻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而日益膨脹，這趨勢在“東華醫院” (Tung-Wah Hospital) 成立之後更為明顯。“東華醫院”是香港第一個具正式規模的華人自治組織，它以一個慈善機構的面貌出現，但在其最鼎盛時期，功能卻非常多樣。雖然英國人並沒有給予它官式確認的法律地位，它卻同時起着儼如市政府、裁判所之職，甚至一度成為一個非正式的中國駐港領事。⁵

香港史學研究者 Lethbridge 指出，東華醫院的華人精英，雖無法在港英政府機構內取得正式的華人代表位置，他們卻積極在滿清和港英政府之間，尋求以各種策略，提升其政治和社會地位。據他所記載，東華醫院襄理每愛邀請港英官員造訪，而每次會面期間，他們均身穿自購的清廷官服，佩頂戴花翎，儼如身負清廷官職，試圖借此提高他們在英人心目中，作

5 見 Sinn, E. (1989)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為華人社群領導者的地位。醫院那群和英人早打交道，能操中英雙語的自封華人“代表”，亦慢慢地成為一班具備特殊的“外交”本領，甚至能助清廷官府處理洋務的中間人。改革派官員張之洞，亦曾透過東華醫院向洋人及海外華人社群搜集情報和打交道，東華醫院的地位可謂如日方中。⁶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年，東華醫院正急劇上升的政治影響力，卻招來香港歐籍社群的不滿，並懷疑它是一個(受清廷指使)，圖謀顛覆港英政府的“秘密會社”，要求港府徹底調查。自此，英人遂立意抑制東華醫院的膨脹，並開始着意培養受全面英式教育的華人精英，栽培他們為香港華人的“代表”。從這時候開始，文化和教育上的殖民主義，才在香港展開，為英人培養其信賴的“土著紳士”(native gentleman)。不過，由於清末英國銳意介入洋務運動，扶持清廷的改革派官僚，所以香港的英語教育，亦以培養一批能穿梭中英的雙語、雙文化的精英為目的。他們負雙重身份，既效忠於英帝國，也為推動洋務的清廷改革派服務。在香港，他們的被委為正式華人代表，成為名乎其實的“高等華人”。

“勾結式殖民主義”

這段早期香港歷史，不單說明了一個獨特的社會

6 Lethbridge, H. J.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化形構 (socio-cultural formation) 的基本成份——這“形構”我在另一個地方詳盡分析過，並名之為一種“勾結式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⁷ 我更認為，這項形構並非只是對香港歷史過去的描述，它更是香港文化“政治潛意識” (political unconscious) 的重要部份。作為一段錯綜複雜的香港“身世”，它到今天還是影響着關於香港政治主體性的 (難以) 產生。事實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香港，從中國大陸移進的人口雖不斷增加，香港的基本政治架構並無大改變。殖民政府和它所培養的“高等華人”，共同分享着這個“勾結式殖民主義”形構的權力。他們並未有把眼光局限在香港，反而深入地介入中國的政治中去。隨後，更為激進的中國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興起，這一批雙語精英也沒有減低其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反而因着進退於香港之便，甚至不時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及英國勢力，成為協助民國革命和建立民國政府的人。他們以政治關係推動商業市場拓展，亦以經濟實力更深地捲入不同的政黨和軍閥派系的傾軋和爭逐中去，構成“雙重”甚至“多重”政治效忠的問題。在國共相爭和對日抗戰時期，這些環繞香港而出現的雙重效忠問題，就一度變得非常敏感和危險。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政權轉易，並沒有使香港人的政治和文化身份明朗。相反，成為了冷戰前哨

7 Law, Wing-sang (2003)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A Genealogy of Competing Chinesenes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亦可參考 Carroll, J. M. (2005) *Edges of Empi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的香港，更充當了敵對各方諜報搜集和交易的重要場所。香港警察的政治部，亦以搜集情報為目的，監控社會各種政治勢力的舉動。政治恐懼的氣氛瀰漫，政治忠誠差不多是每一個人都多少有親身經歷的重大考驗，它比遠為抽象的文化認同問題顯得更為貼身和迫切。四九年後中國大陸上歷次政治運動，亦不時使“香港人”、“香港關係”(connections with Hong Kong)，甚至“曾經居港/到港”的背景，變成政治鬥爭中互相質疑政治忠誠的罪證。簡單來說，問題並不僅在於香港人的身份充滿問題，而是“香港”這樣文化及政治標號(marker)，本身就成為了問題。

政治忠誠本非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質，它從來就是一種生存策略的選擇，也是針對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等客觀壓力的回應。在動盪的歲月，政治忠誠又與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密不可分。二十世紀的上半葉，移居香港的內地人，大多有強烈的鄉黨意識，宗親鄉里的認同。孫中山以香港為醞釀共和革命的基地，也是依靠這些同鄉組織以及會黨(秘密社團)。這些宗族鄉里的團結組織在共和革命的旗幟下被收編整頓，但這個政治化的新國族認同塑造過程，並沒有真正的成功，倒是在統一的“主義”之下，將原來的鄉里宗親認同，轉借為“黨”與“國”不分的“黨國認同”。這種“黨國認同”的模式，也支配着本來以階級或意識形態建立認同的共產黨。

國共兩黨雖然爭相在香港拓展支援基礎，但港英政府除在有限的範圍內，維持那一班傳統上認同

英國的“高等華人”，繼續支援英人在港的統治外，卻也一直沒有為香港建立另一套新的本土政治認同的方案。所以，雖然戰後世界上不少前殖民地已紛紛從英帝國獨立，但相比之下，香港卻缺少一個明朗的政治前景。六七年香港的左派群眾曾發起暴動，目的之一是逼使香港早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但他們在死傷無數的暴動之後才明確獲悉，中央政策是要“長期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無意急於收回。⁸而港英政府就在暴動之後，才開始有比較全面的計劃，將其管治現代化，及更積極地建構香港本身的市民認同。可以見得，在它一百多年的歷史當中，香港都是糾纏在帝國的、國族的、意識形態上的各種深謀遠慮的大計之中，這些謀略都有着別具用心的時空座標，“香港”就好像永遠都在承擔着，某些未必可以告人的“偉大而秘密”的任務。

七十年代以來的學生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雖然主要受益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激發，但新的土生土長的一代，卻在文化表達上逐漸打破舊有的政治教條，重新探索香港在這些交錯和重疊的政治及文化想像地圖上的位置，展現深埋在政治和文化的時空錯置底下的那種香港人的焦慮。電影是香港新一代表達這種對身份衝突的新觸角最有力的媒介之一。以下我會集中討論八十年代以來以臥底作為題材的香港電影，以說明香港的歷史和政治處境，如何透過一個獨特的角色形

象，刻鑄在電影這大眾媒體當中。

臥底作為社會悲劇：《邊緣人》

臥底和間諜一樣，都是肩負秘密任務，也可能面對內心衝突和掙扎。然而，臥底故事和間諜故事不同之處在於，間諜故事難免涉及敵方和我方的對立等國家話語，在戰後初期電影不得涉及敏感政治題材的審查制度下，香港的間諜片並沒有太大的發展。荷李活主流雖然為電影工業樹立了例如“占士邦”(James Bond)的那種浪漫化的智勇雙全的間諜形象，在戰後早期的粵語片中也有仿效(例如《黑玫瑰與黑玫瑰》)，但在八十年代初以表現主義風格為主的“新浪潮”電影中，卻被新興起的臥底題材遠遠拋離。⁹在這些電影中，臥底並非智勇雙全的間諜，並非勇敢而堅毅地完成秘密任務，反而是以悲劇人物的形象出現，在警察所代表的公共秩序世界，和罪惡的黑道世界之間徘徊。

一九八一年章國明執導的《邊緣人》(*Man on the Brink*)可說是香港臥底片的經典之作。在這一部以警匪打鬥、鎗戰和汽車追逐為框架的電影，敘事的結構卻是一個在現實生活壓力的催逼下，為了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而接受臥底任務的探員。同行臥底金興賢不單犧牲性命，主角艾迪更因為得不到家人和女朋友諒解而深受精神困擾。這部破題之作極具寫實風

9 關於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電影，可參閱卓伯棠(2003)《香港新浪潮電影》，香港：天地圖書。

格，對身處黑白夾縫的臥底探員的家庭背景及心理張力，描寫得極為深刻。片末更意味深長地描寫匪幫在公共屋邨作案，警方得臥底線報而圍捕，卻激起居民群起捉賊，憤怒失控的暴民誤將臥底誤作匪徒，活活將之打死，警方在大廈鎖上的閘門外卻無能為力。

七十年代香港警察的貪污無能，雖然受年青社運分子發起的反貪運動挑戰，政府亦成立廉政專員公署(ICAC)急忙整頓，但警察腐敗無能仍是市民共通觀感。一九八一年離中國大陸上混亂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而香港前途問題卻開始出現在政治議事日程之上，香港前途添加了更多不明朗因素，身份的焦慮比起七十年代更為突顯。《邊緣人》罕有的展示激動的居民和無能無奈的警察對峙，場面大膽火爆。主角艾迪失去保護及困身閘門另一邊，並為暴民毆斃，極具震撼地訴說一個迷失了身份的臥底的悲劇命運。警方沒有認真記掛臥底的人身安全，把他留在暴民充塞的閘門之內，其諷喻港英無能繼續關顧香港之題旨呼之欲出。《邊緣人》遂成為一部香港臥底電影的經典之作，兼具社會批判的題旨，及從中投射出對香港集體處境的思索。

臥底英雄：《龍虎風雲》

八十年代末香港電影開始掀起“英雄片”的熱潮，警匪故事廣受歡迎，而臥底題材亦被反覆運用，依附在黑道英雄的類型片中。這類型歌頌匪幫中男性

之間的“義氣”，混進匪幫的臥底探員，往往就捲入情義和職責之間的兩難抉擇。最典型的例子是周潤發和李修賢合演的《龍虎風雲》(City on Fire)。周潤發(高秋)厭倦了當臥底線人的生涯，其上司則訓斥他要“職責盡忠”，周卻反駁此乃“對朋友不義”。片中匪徒李修賢與臥底周潤發之間，漸次建立了信任和友誼，甚至生死與共的“義氣”。導演林嶺東細緻處理了兩人在感情和人生觀上，逐漸產生共鳴和相互信任的過程，也仔細描繪了周潤發對自己的口是心非，產生深深的內疚，“出賣朋友”的夢魘不斷。“忠”與“義”的兩難抉擇，使臥底題材超出過去警匪片的忠奸分明的教化傳統(didacticism)，開展了臥底題材的另一面向，探討法律公義秩序與“義氣”之間的道德掙扎。

“義氣”的道德責任不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而是存在論的(existential)，是倫理上的(ethical)而非道德規條上的(moral)。所以，匪幫中的兄弟情誼，並非指向一永恒的社會道德秩序，反而往往是動盪和不公的社會環境下，一種讓合作和互信暫時建立的生存策略。臥底作為一種執法工具，正是利用這種殘存的人際倫理價值的弱點，來擊破匪幫團結。它在實現一項法律的公義道德標準之時，亦以摧毀另一項道德行為為代價，使兄弟情義都變成出賣和背叛朋友的工具。這樣，臥底和匪徒雙方都會陷入悲劇的結局，成為法律秩序的犧牲者。所以，臥底悲劇的結構，不在於人因性格的某些面向，離棄了法義正義的秩序或人的本